

绪 论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每个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的位置都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都曾建立过全国性或区域性政权，产生过重大影响。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历史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因此，研究中国历史，不仅要研究汉族的历史，还必须重视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少数民族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离开了中国民族史就不可能有完整的科学的中国史。”^①

在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藏民族既有着悠久历史，又有着古老的文化遗产。世界屋脊之所以闻名，就在于藏民族的伟大；雪域文化之所以辉煌，就在于藏民族的勤劳勇敢。藏民族对缔造伟大的祖国，保卫和开拓西南边疆，创造中华文明，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随着藏族文化的发展，藏族先哲顺应历史的潮流，用本民族

江应樑：《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

的文字记录了自己悠久的历史，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如《柱间史》、《红史》、《新红史》、《青史》、《拔协》、《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汉藏史集》、《智者喜宴》、《教法史——花蜜》、《王臣姓氏明灯》、《占昔教言——花鬘》、《嘛尼宝训》、《第吴教法史》、《教法史——佛法经幢》、《教法史——催开教莲之阳光》、《赞普世系》、《布敦教法史》、《王统记——金鬘》、《拉达克王统记》、《萨迦世系史——珍宝库》、《如意宝树史》、《木里政教史》、《贡唐王统世系》、《后藏志》、《教法史——奇异海》、《安多政教史》、《卫藏道场胜迹志》、《雅隆尊者教法史》、《五部遗教》、《萨迦世系史》、《止贡法嗣》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藏族社会不同时期的历史。

十七世纪后，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大量的藏文史料和珍贵文物被帝国主义劫掠到国外。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他们优越的经济实力，建立了藏族研究的学术机构。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大量的藏文史料随之流散，造成了藏族历史上罕见的文献外流。跟随达赖喇嘛而去的高僧喇嘛，纷纷被国外藏学机构聘用，从事大范围、多层次的藏学研究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藏族历史、文化、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藏学。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藏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先后在北京、兰州、成都等地组建了一些藏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开始了对藏区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和藏学人才的培养工作。以于道泉、释法尊、张克强、贡噶活佛、格桑居冕、李有义、王静如、王森、柳升祺、黄奋生、段克兴、王沂暖等为主的藏学专家，专门从事藏学教学工作，先后培养了一大批藏学人才，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各地藏学研究机构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组织起了一支有较高素质的研究队伍，深入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藏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搜集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资料，对我国的

藏学研究作了初步的有意义的探索，产生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藏族历史论著，主要著作有《西藏社会概况》、《新唐书吐蕃传笺证》、《达赖喇嘛传》、《藏族简史》、《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藏族史略》等。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为藏族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恢复和设置了如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四川民族研究所和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四川省藏学研究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迪庆藏学研究所等藏学研究机构。藏学研究充分注意到了 20 世纪初发现的考古等新材料的运用，从政治史、宗教史、民族关系史、社会史等角度对藏族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研究，陆续出版了一批藏族历史研究的汉、藏文学学术著作，如《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史明镜》、《西藏割据史》、《西藏简明通史》、《西藏政治史》、《藏族历史年鉴》、《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宁玛教派史略》、《噶举教派史略》、《萨迦教派史略》、《觉囊教派史略》、《藏蒙佛教史》、《蒙藏民族关系史略》、《蒙藏关系史研究》、《藏族史纲要》、《西藏佛教史略》、《藏族史略》、《羌族源流探索》、《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西藏地方货币史》、《唵厮啰——宋代藏族政权》、《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元朝帝师八思巴》、《宗喀巴评传》、《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桑耶寺简志》、《格鲁教派史略》、《长庆会盟碑与唐蕃关系的演变》、《西藏历史年表》、《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明代藏族史研究》、《宋代吐蕃史料集》、《藏族部落制度研究》、《吐蕃研究》、《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译注》、《吐蕃简牍录》、《蒙藏关系史大系》等。自此藏族历史研究已形成了初步体系，取得了显著成绩。

长期以来，藏族历史研究侧重于西藏历史的研究，甘、青、

川、滇等省藏区地方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加大地方藏族史的研究力度，对整体了解藏族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青海的藏族史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其中，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青海历史纪要》，从史前时期、战国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民国时期等历史时期，对青海的藏族历史进行了全面论述。黎宗华、李延恺先生的《安多藏族史略》，对安多地区藏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陈光国先生的《青海藏族史》，对上古时期的青海羌人、中古时期活动于青海的吐蕃和唃廝囉以及近现代的青海藏族，进行了翔实的考证。甘肃藏族历史的整理工作已成为藏学研究领域中亟须解决的课题，撰写《甘肃藏族史》已成为我们的紧要任务。

二

甘肃省地处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处，为我国的腹心地带，东连陕西，南接四川、青海，西邻新疆，北靠内蒙古、宁夏，是历史上中原联系中亚的主要通道，著名的“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横穿其境。境内雪山连绵，草原广阔，江河纵横。数千年来，广大的藏族就在祁连山南北及黄河上游的陇西等地繁衍生息。藏区占地面积较广，总面积为 138926 平方公里，牧业比重较大。藏族人口分布较为稀疏，主要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和河西走廊地带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以及陇南的岷县、宕昌、武都、文县等区，总人口约 411900 人（第四次人口普查数）

甘肃藏区不仅自然风光雄奇瑰丽，而且人文景观丰富多彩。历史上的甘肃藏区，地处偏僻，交通闭塞，人文落后，历史典籍对该区的记载少而零散，人们对甘肃藏族历史的了解大多是一鳞半爪。二十世纪 30~40 年代以来，甘肃藏族史的研究逐步开展

起来。随着本地区一些散见的金石、简牍、档案及藏族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翻译，甘肃藏族史的研究获得了新材料和新途径。在甘肃藏族地方史的研究方面，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如黄正清口述、师纶整理的《黄正清与五世嘉木样》，樊保良、水天长主编的《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杨士宏的《卓尼杨土司传略》，苗滋庶、李耕、曲又新、罗发西合编的《拉卜楞寺概况》觉乃·洛桑丹珠、冰角·婆帕次仁的《安多古刹禅定寺》，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合编的论文集《拉卜楞寺与黄氏家族》丹曲的《拉卜楞寺简史》旺谦、丹曲编著的《甘肃藏传佛教寺院录》，甘肃人口普查办公室编写的《甘肃藏族人口》，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甘南州志》以及有关各县县志等。然而就甘肃藏族的整个历史而言，至今尚未有人做过系统研究。有鉴于此，1997年初，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将《甘肃藏族史》的课题纳入了选题计划。

甘肃藏族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期，甘肃大地上就有人类居住。如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的考古发现，为我们了解甘肃藏族先民的文明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先秦时期，甘肃藏族先民羌、戎、氏等活跃在祖国西北地区，他们以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部落众多，名称各异，分布广泛。此后他们受华夏文化的影响，社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夏、商、周时期，羌人虽与华夏族发生了频繁战争，但文化及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西周时期，羌人非常强盛，推翻了西周政权，并借机攻入了陕西、河南等地区，直到春秋时期，华夏族战胜羌人，这种局面才得到了扭转。春秋末年，中原和陕西的羌人逐渐被消灭和同化，残部退回汧、陇以西。战国时期，秦国与羌人也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和较量，最后，秦国消灭了羌人义渠王国，进兵渭首，征服狄獯，控制了羌人。羌人首领无弋爰

剑的后裔在甘、青、川、康、藏得到了繁衍，羌人出现了一次发展高峰，社会生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秦汉时期以后，甘青藏区的羌人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不同，称谓也发生了变化，大抵住在西南长江系统嘉陵江流域山谷地带的称氐，住在西北黄河系统湟水流域和洮河流域高原地带的称羌。汉武帝时期，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四郡，隔断了羌胡之间的联系。东汉时期，统治阶级和羌人进行了激烈的争斗，湟水、大通河、黄河、大夏河以及洮河流域成了争夺的地域。加之统治阶级政治腐败，对杂居区的羌人残酷压榨和奴役，羌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造成了民族间的仇恨，西羌反攻，东羌呼应，羌人势力蔓延到山西、河南中原一带，三国时期形成了陕、甘地区汉羌杂居的形势。

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动荡，羌人乘时东侵，纷纷建立割据政权。氐人前秦苻坚占据了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一带，后凉吕光占据了甘肃西北部和青海东部，仇池杨氏占据了甘肃东部和汉中北部，蜀成李氏占据了四川和陕南，后秦姚萇占据了陕西、甘肃和河南一带。西晋末年，吐谷浑攻入甘青藏区，与羌人发生了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羌部落纷纷依附，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发展变化，羌人与吐谷浑、汉人等共同开发这一地区。吐谷浑兴起时，甘肃曾存在过宕昌羌、邓至羌、党项羌三个地方政权，一度占据今甘南的部分地区。这一时期，氐人和羌人与汉族交流频繁，高度接受了汉族文化，农牧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吐蕃帝国”。与此同时，中原地区出现了大唐盛世。唐蕃并驾齐驱，成为称雄亚洲大陆的两个强大政权，共同构筑起友好往来的“汉藏”金桥。在唐蕃互通有无的过程中，在甘、青藏汉交界处却演绎了一幕幕战火风云，对甘肃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九世纪中叶，吐蕃王国因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开始由盛而衰，继而分崩离析。与此同时，大唐帝国也日薄西山。此后，西北地区成为北宋、西夏和唃廝囉等汉、藏政权角逐的政治舞台，西北少数民族包括藏民族卷入了无休止的战争漩涡之中。

十二世纪下半叶，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诸部，用战争的手段征服了北方的许多地区，灭夏伐金，统一中国。在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蒙古西凉王阔端在甘肃的经济文化重镇凉州，迎请了藏传佛教高僧萨迦班智达，进行了历史性的“凉州会晤”，树起了祖国统一的历史丰碑，雪域高原正式纳入祖国版图，甘肃藏区成为元朝对藏区施政的中心。

十四世纪中叶，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王朝，因兵力主要用于北边防御，故尊崇藏传佛教僧人，俾其“率修善道，阴助王化”，实行“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统治政策，以达到“隔绝蒙藏联络，巩固明朝的统一”的政治目的，在甘、青、川藏区设立卫所制，军政合一，同时推行土司制度，由汉藏官吏共同参治。这一时期，甘肃的河、洮、岷地区成为明朝向广大藏区施政的战略要冲，代表藏族文化精英的“洮岷三杰”——华丹嘉措、华丹扎西、释迦，成为往来于朝廷和藏区的使节，藏区得到了有效治理。

十五世纪中叶，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格鲁派确立了在藏区的统治地位，西藏地方的“政教合一制度”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甘肃卓尼杨土司的政教合一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拉卜楞寺也逐步形成了“政教合一制度”体系。这两大政教合一势力，对整个西北藏蒙地区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甘肃藏区处于清中央王朝直接统治下的土司土官统治、藏传佛教寺院政教合一统治相互交替的社会形态。

鸦片战争以后，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者像潮水般涌进了中

国，他们以“游历”“布道”为借口，先后闯入甘肃藏区，搜集情报，窃夺文物，建立教堂，从事政治和文化侵略活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遭到了藏、回、汉等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

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爱国革命志士忍辱负重，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洪流中，其中一些远赴边疆地区，点燃革命的火种，各族人民热烈响应，形成了极为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1926年，中共早期优秀党员宣侠父来到甘南，给藏族人民指明革命的道路，使甘南藏区摆脱了马家军阀的黑暗统治。在各界爱国人士的努力下，甘肃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先后在卓尼、肃南、拉卜楞创立了许多学校，甘肃藏族的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了民族教育体系，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35年和1936年，红军越过千里雪封的岷山，渡过白水险隘栈道，攻克闻名遐迩的天险腊子口，在藏族人民的无私支援下，完成了长征史上一段艰难曲折的征程。也正是由于红军长征播下了革命火种，1943年爆发了以肋巴佛为首的甘南各族人民大起义，燃起了反抗国民党暴政的熊熊烈火，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甘南民主革命洪流，震慑了国民党的腐朽统治。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甘肃藏区的有识之士积极响应地下党的号召，以他们特殊的身份，从事甘肃藏区的和平解放事业，最终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使甘肃藏族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三

甘肃藏族史虽然属于地方史的范畴，但甘肃藏族的历史发展离不开藏族历史发展的大背景，又由于藏族活动范围的广大和不确定性，民族分布与行政区域的不完全一致性，加之历史上河西走廊特殊的地理位置，考察甘肃藏族史不能离开西藏、青海、四

川、云南等地藏族的活动；甘肃又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地带，历史上的甘肃藏族与居住在这里的其他兄弟民族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此，考察甘肃藏族史同样也不能离开活跃于甘肃一带的汉、蒙古、回、裕固、土等其他民族的活动。

有鉴于此，本书的写作在体例上作了如下处理：

（一）本书分绪论、正文、大事记、附录以及参考书目五部分。

（二）由于甘肃藏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本书对历史时期的划分不完全根据中原王朝的更迭，而将甘肃藏族的发展划分为几个较大的历史时期，以涵盖不同地方政权在甘肃藏区的活动。

（三）本书采用公元纪年法，并按具体情况和需要，标注中原王朝年号纪年，涉及藏族历史背景时，则尽量标注藏历甲子纪年。

（四）文中就个别历史事件和历史遗址作了纵向考察，突破年代的划分，以求有关历史线索的连续性。

（五）由于地方史料的欠缺，我们有时只能将有关甘肃藏族历史放到整个藏族历史的大背景中考察，某些具体问题留待将来新材料的发现再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六）大事记的编排依据确切年代的记载。甘肃藏族历史上没有确切纪年的大事付之阙如，以待进一步考证。纪年下所列事件，如事主为该年号所属王朝或政权，不再复出。发生在甘肃地区，无关甘肃藏族历史的事件亦附见于大事记。

（七）附录部分收录了文中涉及的重要事件的有关原始史料。

第一章 早期的甘肃藏族先民

藏族历史研究在考古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性成就。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引起了中外考古界和藏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极大地开阔了我们认识青藏高原古文明的视野，从而展示了藏民族远古文明的内涵、发展轨迹及其与黄河流域文明的渊源关系，为认识藏族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第一节 藏族先民的远古文明

一、青藏高原的远古文明

二十世纪初，大批国外传教士、商人、探险家及少数学者曾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进入藏区进行考察。尤其 40 年代，意大利著名东方学家杜齐教授曾数次旅行西藏，进行了田野考察，撰写了《穿越喜马拉雅》（汉译名《西藏考古》）一书，从考古的角度概括性地总结了他几十年来对藏族文化艺术史的研究。尽管其中的资料因时间、来源的模糊，某些推论缺乏真实性，但这种开创性的尝试给以后的考古工作者以重大的启示。

人们认为，在远古时代，藏区是一片荒芜不毛、高寒干燥的土地，完全不适于人类生存。国外人类学家甚至认为，直到新石

器时代晚期，青藏高原才开始有人类居住。长期以来，人们对藏族古代文明的认识有很大的分歧。就藏族来源问题而言，一直是国内外史学家争论不休的历史“悬案”，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有西羌说、鲜卑说、缅甸说、蒙古说、伊朗血统说、土著与氏羌融合等近十种之多。大多数学者认为，藏民族的祖先是来自藏区以外的地方迁入的。这些论说除个别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之外，都或多或少有藏汉史籍记载或民族学、语言学的证据。

从西藏地区的第四纪地质学的观点看，青藏高原在第四纪更新世不像今天这样干燥寒冷和缺氧，特别是在间冰期，其气候状况和现代不一样，甚至更温暖，所以在亘古时青藏高原就是适于远古人类生存的好环境。地质构造和各地已发现人类化石的地理分布等种种迹象，说明介乎亚欧次大陆和印非大陆之间的青藏高原是发现人类化石十分重要的枢纽地带。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对青藏高原珠穆朗玛峰地区的科学考察报告分析，以及我国和世界各地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及其他地理分布的纵向综合研究，都说明青藏高原亘古以来就是适于人类活动的乐土。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尚未发现远古人类化石。没有发现，并不意味着没有。科学研究的结论为我们在青藏高原地区开展对人类化石的寻找、探索和研究，展现出了极为有利的前景。^① 旧石器的发现，更直接证明在青藏高原有古人类存在和有古人类化石。

1956 年 7 月 8 日，中国科学院的地质学家在青藏高原长江源头一带首次发现了十几件打制石器，其中包括被认为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从此，揭开了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有人类生存的谜底。

1966 年至 1968 年，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在西藏定日

张民德：《试论西藏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西藏民院学报》，1992 年第二期。

县东南 10 公里的苏热山南坡，发现 40 件人工打制的石片以及用石片做成的刮削器和尖状器等。再一次证实了远古时期青藏高原人类生存的踪迹。

1976 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申扎县珠洛勒发现打制石器 14 件，均为石片石器，器形有边削器、端刮器及尖状器三种。此后在藏北的日土、普兰县又发现了一大批旧石器。这些打制石器经研究者初步断定，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有五处，即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洛勒，日土县的扎布，普兰县的霍尔区。

根据西藏所发现的旧石器本身的形制，制造技术及同周围的旧石器特征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这些石器基本上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物，年代是在距今 5 万年至 1 万年之间。除此之外，1982 年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湖滨阶地的砾石层中发现了一批人工打制的石制品，这是目前为止青藏高原地区发现的惟一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遗址，因此对此年代做出了较为准确的判断。根据碳 14 测定和地层对比，这批石制品的年代距今大约 3 万年。它的发现表明在更新世气候条件较好的时期，青藏高原同样有人类活动。^① 青藏高原旧石器文化遗存的发现，在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史前考古领域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人们对藏族远古文明的认识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大约一万年，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标志是出现了磨制石器和陶器，但打制石器在这一时期仍然使用。农业由单纯依靠狩猎和采集植物果实与根茎作为人类生活资源的单一经济逐步发展为农耕生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使人类定居

黄慰文：《柴达木盆地发现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5 年 4 卷一期，另据贾兰坡、黄慰文等：《三十年的中国旧石器考古》，《文物与考古论集》第 10 页，文物出版社，1986 年。

下来。家畜饲养也成为可能，制陶和纺织业等各类生产已经产生。各部落之间以物易物的交换业已出现。原始社会的实物交换促进了各种文化成就的传播。新石器时代的青藏高原，原始文化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截止到 1992 年，西藏发现属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地点多达五十余处，其中包括细石器地点 28 处^①。以藏东河谷地区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以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曲贡村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和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藏北细石器文化三种文化以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特色，构成了藏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格局。

卡若文化 以昌都卡若遗址为代表。该遗址于 1977 年和 1979 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主持进行了两次科学发掘，发掘面积约 1800 平方米。共发掘房屋遗迹 28 座，打制石器六千余件，磨制石器 511 件，细石器 629 件，骨器 366 件以及大量陶片。农作物有粟。动物骨骼经鉴定属饲养的品种有猪，属猎获的品种有鼠、兔、獐、马鹿、狗、牛、藏绵羊、青羊、鬣羚等。根据文物差异和地层土质的变化，卡若遗址分为早、晚两期，碳 14 测定年代，早期距今 4655 年 ± 100 年 ~ 4280 年 ± 100 年，晚期距今 3930 年 ± 80 年。陶器以罐、盆、钵为基本组合，均为小平底，不见三足器和圈足器。石器中有铲形器、砍砸器、剖面呈五边形的石凿及刃开在弓背部的半月形石刀等独特类型。另外，卡若遗址地处澜沧江边，却不见任何捕鱼工具，也未发现鱼骨。相关文物史料的对比分析表明：卡若文化与同一时代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的文化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卡若出土的打制石器肩石斧、盘状敲砸器、磨制的条形石斧、凹背直刃石刀等，同样在马家窑系统文化中也有大量的发现。卡若文化的陶器

^①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文物》1985 年第九期，1~8 页。

特点和器形很大程度上也与马家窑系统文化相类似。彩陶被认为是黄河流域氏羌系统原始文化的主要特征，而卡若也发现了彩陶，其制作风格与马厂类型的彩陶相似。卡若遗址中还出现了人工栽培作物——粟，显然也与马家窑文化有关。此外，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也存在一定联系。^①

曲贡文化因 1984 年在拉萨市北郊曲贡村发掘出的代表性遗址而得名。除此之外，属这一文化类型的遗址还有林芝县的云星、红光、居木、加拉马，墨脱县的背崩村、墨脱村、马尼翁，乃东县的钦巴村等，均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1990 年，曲贡遗址又有重大发现。在第一阶段发掘的 500 平方米，就出土近万件成型文物。出土的石器大多为打制石器，有石刀、石梳、石磨等生产生活工具。陶器有单、双耳罐，大肚高颈罐和工艺水平很高的菱形纹黑陶罐。还发现墓葬坑和四具完整的人骨架。其特点是石器中出现了两侧带缺口的渔网坠和打制的双肩石铲、石刀、琢制磨盘等农业工具，不见细石器。陶器以泥质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器形以罐、盆、豆、碗、壶为主。^②从文化特征上看，曲贡文化比卡若文化先进，因此考古专家们认为它晚于卡若文化。因目前曲贡遗址大批的发掘资料尚未问世，与其他文化的系统对比研究还有一定困难。

藏北细石器 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分布有极为广泛的细石器文化。发现地点共有 28 处，细石器标本一千余件。这些细石器地点，除聂拉木县的亚里村、羊圈，吉隆县马法木湖岸和卡若遗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董恩正、冷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相关问题》，《民族研究》，1983 年第一期。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拉萨曲贡村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85 年第九期；《曲贡文化遗址重大发现：拉萨河谷早有农业文明》，《人民日报》，1990 年 9 月 26 日第四版。

址等 4 处分布于藏南外，其余 24 个地点均分布在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以北的藏北高原地区。尽管西藏细石器的分布遗址十分广泛，但各地发现的细石器都有相同的文化特征，故考古学者认为均属“同一文化系统”。^①

西藏细石器无论类型或加工技术都与我国东北、内蒙古、华北北部至新疆一带分布的细石器属同一个体系，即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如细石器中占很大比例的楔形石核不但在黄河流域有广泛分布，而且也普遍见于东北、内蒙古和新疆一带的细石器中。

就以上三种文化，藏学研究工作者进行了认真的对比研究，指出：“毫无疑问，新石器时代存在于西藏高原的卡若、曲贡和藏北细石器三大原始文化，已分别代表着文化面貌和构成各不相同的三大原始居民群体。这三大居民群体在西藏高原不同区域内分别从事着不同的经济活动，已经奠定了以后西藏文明基本格局的雏形，同时，这三大居民群体已无疑是后来构成藏民族的三个基本来源。因此，现在考古资料已使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藏民族是一个多元的民族，它直接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三大原始居民群体的融合。这三大原始居民群体即是：西藏高原的土著居民群体；由北方草原地区南下的游牧居民群体；从东部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氏羌系统居民群体”。^②当然这种结论，还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科学论证。

二、甘肃藏族先民的远古文明

甘肃在历史上称为陇，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被誉为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横穿其境，长江的水系白龙江也斜贯入

^①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文物》，1985 年第九期。

^② 石硕：《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中国藏学》1992 年第一期。

境，其余的如洮河、大夏河、大通河、金强河等河流遍布，给古代文明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根据现有考古史料，在今天的甘肃藏区至今尚未见到早期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但就地理条件、自然状况和动植物化石标本而言，可以说古人类的生存具有良好的条件。如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合作红土尔庄发掘的一千万年以前的犀牛化石，玛曲出土的披毛犀、野牛和象牙化石等等，均为我们提供了古人类可能在这个地区生活过的历史线索。^①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遍布全省，最具典型的是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甸文化、寺洼文化以及土著文化。

大地湾文化 大地湾文化是 1958 年甘肃省文管会在文物普查时，在秦安县的五营乡邵店村首次发现而得名的。该文化遗址当时被发现后，仅视为一个普通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 1987 年开始，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选择发掘，重要发现层出不穷，发掘持续连年，遗址的最下层发现了新时期早期遗存，它比仰韶文化早 1000 年^②，被学术界认定为我国新石器考古的重大突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1988 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大地湾文化因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意义，被学术界评为中国 20 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③。

大地湾遗址总共发掘面积 14752 平方米，清理房屋遗址 240 座，灶址 98 个，灰坑和窖穴 325 个，墓葬 71 座，窑址 35 座以及沟渠 12 段，出土陶器 4147 件，石器（包括玉器）1931 件，

李振翼：《甘南简史》，《甘南文史资料》（第五辑），1986 年。

^② 朗树德：《大地湾遗址的发现和初步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2 年第五期。

^③ 《光明日报》2001 年 3 月 30 日、4 月 10 日

骨角牙蚌器 2218件以及动物骨骼 173000多件^①。大地湾遗存分为五个文化期：

第一期文化，碳 14 测定年代距今约 7800~7300 年。发现的四座房址为圆形半地穴式建筑。墓葬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陶器以大细砂褐陶为主，陶色不匀，以圜底钵、三足罐、直筒罐、小口壶、圈足碗多见，流行规整的绳纹。钵形器口沿内外饰以紫红色彩带，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彩陶。陶器制法独特，为模具敷泥法。石、骨器数量不多，加工粗糙。

第二期文化，碳 14 测定年代距今约 6500~5900 年。发现房址 156 座。房址除两座为圆形外，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多见，部分房址已开始穴壁四周立柱建墙，增大了室内空间，改善了采光和居住质量，室内设置了固定的灶坑，供人们取暖和做饭。在聚落中心开辟了公共墓地，墓葬分为成人墓和儿童瓮棺墓，成人墓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左侧置随葬器物。陶器典型器物有圜底钵、叠唇或卷沿盆、葫芦形口尖底瓶、侈口双唇深腹罐、敛口瓮、尖底缸等，纹饰多为斜绳纹。出现大量的彩陶，其中的两件鱼纹大盆，红陶黑彩，口径五十余厘米，是极为宝贵的史前艺术品。一件人头器口彩陶瓶，将造型、雕塑、彩陶艺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是这一时期史前艺术的代表作。制陶以泥条盘筑法为主。石器、骨器数量增多，出现了玉锛、玉凿、碾磨石、碾磨棒、碾磨盘等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

第三期文化，碳 14 测定年代距今 9500~5500 年。房址均为近方形和长方形，出现双联灶，少数房址地面使用料姜石。彩陶发达，黑彩为主，图案精美，线条活泼，以弧形线条构成的几何图案为其特色。陶器有敛口钵、曲腹盆、双唇口尖底瓶、鼓颈

^① 朗树德：《大地湾遗址的发现和初步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2 年第五期。